

河北省高等学校青年拔尖人才计划项目（BJ2018217）资助成果
衡水学院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对比研究

——以创造和受容为中心

李洪良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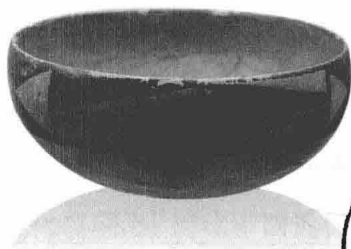


燕山大学出版社
YANSHAN UNIVERSITY PRESS

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对比研究

——以创造和受容为中心

李洪良 著



 燕山大学出版社

2020 · 秦皇岛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对比研究：以创造和受容为中心 / 李洪良著. —秦皇岛：燕山大学出版社，2020.5
ISBN 978-7-81142-622-9

I. ①近… II. ①李… III. ①比较文化—研究—中国、日本 IV. ①K203 ②K313.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82768 号

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对比研究——以创造和受容为中心

李洪良 著

出版人：陈 玉

策划编辑：朱红波

责任编辑：朱红波

封面设计：杨 凯

出版发行： 燕山大学出版社
YANSHAN UNIVERSITY PRESS

地 址：河北省秦皇岛市河北大街西段 438 号

邮政编码：066004

电 话：0335-8387555

印 刷：北京建宏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00mm×1000mm 1/16

印 张：12.25 字 数：206 千字

版 次：2020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42-622-9

定 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印刷、装订质量问题，读者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335-8387718

作者简介:

李洪良,男,河北衡水人,中国共产党党员,韩国圆光大学日语语言文学专业博士,衡水学院副教授,日语教研室主任。2003 年参加工作,2014 年受聘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河北分会常任理事。在报纸、杂志发表多篇论文,主持承担了河北省社科基金课题“京津冀协调发展背景下河北文化创造力提升策略研究”(HB17ZX010)和河北省文化艺术科学规划立项课题“文化创造视角下武强年画保护和传承研究”(HB16-YB028)。

前言

本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通过考证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创造的不同表现和对比中日传统文化在文化创造方面的倾向,探讨在文化中心移动的背景下,中国如何借鉴日本经验并结合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构建符合自身发展的文化创造力提升体系。

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探讨了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下文化创造力提升的重要性,文化创造力实现的表现形式,并阐发了文化创造的倾向问题,即文化创造就其倾向来说可以分为独创性倾向和受容性倾向。进而认为,在多元文化并存和相互融合的时代背景下,异文化受容对文化创造的实现和文化创造力的提升发挥着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

考证了近代之前中日两国文化创造在生产力、精神力、传承力、传播力、批判力五个方面的不同表现,进而分析了两国在文化创造力实现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不同的传统倾向,即中华文化在近代以前的文化创造更多地体现为强大的独创性倾向,而日本的文化创造则更多地显现为受容性倾向。

对近代以前中日两国文化创造力发展状况的考证是建立在文化学和创造学相关理论基础上的跨学科综合研究。本书的考证以文化创造为研究视点得以展开,具体来说,基于农耕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考察文化生产力;对比民族文化创造精神以考察文化精神力;对比源远流长的中国“大一统”思想和“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制以考察文化传承力;对比中国近代以前的儒家“异类”思想和日本神道的发展与佛教、儒学的结合和分离以考察文化批判力;基于中心—边缘的文化扩散模式考察文化传播力。

在完成相关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中华文化创造价值观的相关思想和论述,进一步挖掘中华文化的传统内发性,分析其文化创造的独创性倾向;结合日本文化的受容性以及深层次的“边境意识”,推论日本文化创造的受容性倾向。

提出了“创造性古典主义与多元融合”的文化创造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首先是基于近代之前中日文化创造力表现的考察,在近代之前,中国的文

化创造具有强大的独创能力，突出地体现为强大的文化生产力、文化精神力、文化传播力，而日本的文化创造在文化传承力和文化批判力的体现更为显著；这一理念的提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创造的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的文化创造更多的是体现为创造性倾向，即独创和同化，而在中国文化已不具备成为中心文化的情况下，有必要调整中国文化创造的实现形式；这一理念适应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中国文化的发展，当今世界各国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应该抓住机遇，在继承传统的前提下，创造性地融合外来文化，并适时地调整文化受容路径以促进文化创造力的现实转化，最终谋求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整体提升。

目 录

第1章 序论	1
1.1 研究动机	1
1.2 先行研究	1
1.3 研究方法和范围	11
第2章 多元文化视角下的文化创造	13
2.1 文化创造的重要性	15
2.2 文化创造力的表现形式	18
2.3 多元文化背景下文化创造倾向的解读	26
2.4 三种文化受容路径的特性	28
第3章 农耕经济发展视角下的中日文化生产力	34
3.1 原发兴起的中国农耕经济	34
3.2 受容激发的日本农耕经济	47
3.3 小结	61
第4章 民族文化创造精神中的中日文化精神力	64
4.1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华民族文化创造精神	64
4.2 综合统一、淳化超上的大和民族文化创造精神	70
第5章 政治体系延续下的中日文化传承力	75
5.1 源远流长的中国大一统观念	75
5.2 万世一系的日本天皇制	80
第6章 经典思想凝结中的中日文化批判力	86
6.1 内发而乏力的中国文化批判力	86
6.2 内外交织的日本文化批判力	94
第7章 中心-边缘互动下的中日文化传播力	100
7.1 中华文化的传播力	100
7.2 宗藩关系下的中日文化互动	105

7.3 中日文化互动的文化扩散解读	107
第8章 中日文化创造传统倾向之比较	110
8.1 创造性倾向强的中华文化	110
8.2 受容性倾向强的日本文化	116
8.3 中心文化的移动及中日近代文化更新	120
第9章 文化受容下的日本近代化	125
9.1 所谓日本的近代化	125
9.2 武士思想与近代化	127
9.3 文化批判下的文明开化	132
9.4 近代化与日本传统	138
第10章 文化创造倾向转型下的中国近代化	146
10.1 近代性之于中国	146
10.2 西方近代化思想的导入	147
10.3 传教士的文化参与及其政治影响	151
10.4 近代化中儒家价值观的再认识	161
第11章 “创造性古典主义与融合”文化创造理念的提出	170
11.1 创造性古典主义与融合符合多元文化下中华文化复兴的要求 ..	170
11.2 创造性古典主义与融合注重传统内发性	171
11.3 创造性古典主义与融合注重积极的文化受容	172
结论	175
参考文献	182

第1章 序 论

1.1 研究动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实现了人民生活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赢得了国际地位的空前提高。然而,在当前世界文化多元一体的格局中,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发展却呈现出严重的缺失,出现了诸如传统文化流失严重、价值观重构和传播不足、伪文化现象层出不穷、国际话语权劣势明显等问题,这些问题制约了中国综合国力的整体提升。文化软实力发展的滞后源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创造力整体发展的失衡与不足。回顾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中华文化在近代之前富有强大的文化创造力,而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中国没能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融合外来文化,进而取得文化创造力的整体提升。而自古以来在中华文化的深刻影响下,形成自身独特文化并取得发展的日本在进入近代以后却能够很好地将本土文化与西方强势文化相融合,创造出与日本国情相适应的近代文化,从而步入发达国家行列,这充分地显示了日本文化在多元文化背景下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创造力。因而有必要对近代以前中日两国在文化生产力、文化精神力、文化传承力、文化批判力、文化传播力等几个方面的不同发展状况进行比较,进而探究两国传统的文化创造倾向以及文化创造倾向与近代以来文化转型的逻辑关系。在完成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创造力的相关考察和中日两国传统文化创造倾向分析的基础上,构建适应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中国文化创造力提升的文化创造理念,以期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指导中国文化创造力的整体提升。

1.2 先行研究

在对近代以前中日文化创造力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对文化、创造、文化创造等相关概念和研究进行一定的界定和梳理。

1.2.1 理解文化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最早见于《周易》，《周易·贲卦》有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①其中的“人文”“化成”表达了古代中国人对文化内涵的理解：文化即人化，以人文教化天下。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说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天下也。”^②意思是说用圣人的诗书礼乐去教化、感染、熏陶人，因而，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与武力征服的“武功”相对应。

现在所广泛使用的“文化”一词就其词源来说，属于拉丁文 culture，拉丁文中的 culture 有耕种、居住、练习、留心或注意、敬神、加工、修养、教育、文化、程度、礼貌等多种含义。德文、英文、法文的“文化”一词都来自拉丁文 culture，而现在中国所用的“文化”一词的概念被认为大约是 19 世纪末经由日文转译而来。

文化的专门研究始于 19 世纪下半叶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兴起，展现出了多学科、多角度的研究特点。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1871）一书中提出了其著名的文化定义：“所谓文化或者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能力、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③从泰勒对文化的定义，可以看到泰勒已经注意到了文化的分类问题，即人类从长期经验中所创造的包括物质内容与精神内容的共同生活方式是广义的文化类型；而狭义的文化则是指学术思想等精神层面的活动及其成就。从爱德华·泰勒进行文化的定义开始，关于文化的定义已达 300 余种，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定义方法：第一种是广义或狭义的定义方法，第二种是功能性或主体性的定义方法。

广义的定义方法区别了文化与文明，将文化定义为人类所创造的文明的总称，或定义为人类生存方式。历史学家汤因比、斯宾格勒都属于广义文化论者。狭义的定义方法仅指精神性、观念性的东西，如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认为：

① 高亨：《周易大传今注》，齐鲁书社（1979），第 226～227 页。

② 王弼注，孔颖达疏：《周易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 105 页。

③ 泰勒著，蔡江浓编译：《原始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第 1 页。

“文化指一个社会中的价值观、态度、信念、取向以及人们普遍持有的见解。”^①

功能性定义是将文化定义为一种规则。如莫利斯强调：“一种文化是生活的蓝图。一群互相影响的人本着这一蓝图而特别崇尚某些行为动机而不崇尚别的行为动机；或者，他们宁愿采用某些方法而不采用其他方法来实现这些动机。”^②以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文化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在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中，为应付该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的、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③。

主体性定义关注文化的“属人性”，是一种从文化创造的主体——人的角度进行的定义。进入20世纪以来，文化的主体性日益引起学界的重视，德国学者格奥尔格·西美尔首先看到了客体文化与主体文化的区别，他批评说，自工业革命以来，“客体文化突飞猛进，主体文化却不能增进”^④。这里的客体文化是指物质文化，而主体文化是指与人密切相关的思想意识方面的文化。卡西尔作为西美尔的学生，将文化定义为“人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⑤。马尔库塞认为文化应该关注人性的解放和完善，而科技是文化的物化形式，科技的每次进步都是对人本性的压抑，真正的文化应该是人的解放的尺度。上述种种观点对文化的含义进行了跨学科多角度的分析，揭示了人类文化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元性，同时也为人们深入理解文化的性质和特点，从而进行更加系统、全面的文化创造比较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完成以上对文化定义和解释梳理的基础上，本书所展开的文化创造力相关研究建立在一种具有超越性和综合性的文化理解，即文化整体观之上。正如郭湛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文化概念的历史演变，总的说来是由狭义的文化概念向广义的文化概念发展的过程，就文化观而言，实际上是由局部文化观向整体文化观的转变，即从只看到部分文化向对文化整体认识转变，也就是由小文化观向大文化观转变的过程”。郭湛教授同时指出：“大文化观作为一种文化整体观是以广义文化概念为科学依据的，它不同于时下流行的那种泛文化观。那种

① 亨廷顿、哈里森主编，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新华出版社（2002），前言第3页。

② 张忠利、宗文举：《中西文化概论》，天津大学出版社（2002），第8页。

③ 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等：《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第371页。

④ 西美尔：《论文化的本质》，转引自《德国哲学》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第198页。

⑤ 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第288页。

泛文化观的特点是把什么都称为文化,但并不放眼于文化的整体,而只着眼于文化的局部;泛文化观不过是将局部文化泛化了,它所关注的仍是某种文化现象,本质上仍属于局部文化观,是一种外延扩大了的小文化观,远未达到整体观的高度。”^①而加拿大著名的文化学者D. 保罗·谢弗教授也有着同样的认识,他指出:“文化是与人们看待和解释世界、把自己组织起来、处理自身的事务、提高和丰富以及与在世界上定位自身等有关的有机的和动态的整体。”^②

1.2.2 创造的内涵

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旋律,发展本身就蕴含着推陈出新,意味着创造、创新,在世界范围内各个行业和领域中,创造、创新、创造性、创造力等已经作为热门词而被频繁地使用,创造的观念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创造的价值也在不断地以多种形式得以实现。然而,对于创造的内涵却很少有人能够深入地理解,正所谓习焉不察,因而有必要从词源方面对创造的内涵进行一定的梳理。

中国古代关于“创造”一词的记录最早出现于陈寿所著《三国志·魏书》,其中写到“诸葛诞创造凶乱”^③,表达的是“制造、引发某种局面”的意思。类似的还有《宋史》第三百五十卷中的“曾布言贍创造事端,以生边害,万死不塞责”^④,等等。不过,经刘仲林等学者的考证,这种用法在古代文献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多,“创造”更多地用于表达以下几种意思:一为“建造”,如《隋书·高祖纪上》写到“诏……等创造新都”^⑤;二为“制作”,《隋书》中记载“大业元年炀帝始诏……等宪章古制,创造衣冠”^⑥;三为“开创”,《南史·梁本纪上》所载“及齐高创造皇业,摧锋决胜,莫不垂拱仰成焉”^⑦;四为“创作”,《后汉书·应劭传》所载“其见汉书二十五,……其二十七,臣所创造”^⑧;五为“发明”,《宋书·礼志五》所载“至于秦汉,其指南车制无闻,后汉张衡始复创造”^⑨。

① 郭湛:《转向大文化观》,《新视野》1996年第3期,第37~38页。

② D. 保罗·谢弗著,许春山、朱邦俊译:《文化引导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第51页。

③ 陈寿撰,裴松之注,陈乃乾校点:《三国志》(第一册),中华书局(1959),第140页。

④ 脱脱:《宋史》(第三十二册),中华书局(1977),第11072页。

⑤ 魏征:《隋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73),第17页。

⑥ 魏征:《隋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73),第262页。

⑦ 李延寿:《南史》(第一册),中华书局(1975),第168页。

⑧ 范晔撰,李贤等注:《后汉书》(第六册),中华书局(1965),第1613页。

⑨ 沈约:《宋书》(第二册),中华书局(1974),第496页。

英文中的“创造”(create)是由拉丁文 *creatum* 发展而来,是动词 *creare* 的过去分词。*creare* 意为 *to produce, to make*, 有“创造”“生产”“创建”的意思。根据蒲柏的考证,15 世纪晚期才出现了现在时态的“创造”(create),这一时期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等西方神学思想的影响,人们强调的是神的创造,认为万事万物都是神创造完了的东西,所以“创造”(create)的意思主要是 *what was created*, 即“创造出来的东西”。16 世纪,人作为创造的主体受到重视,因而 create 的词义也得以扩展,指涉“现在的或未来的创造”(present or future making)。在 17 世纪末期,create 和 creation 作为人的行动被广泛接受,当时还出现了形容词 creative,意思是“神圣的、奇迹的、具有创意的”,仍然带有旧时的内涵。而进入 18 世纪,creative 一词被赋予更多的积极意义,开始关注创造与人之间的联系,将创造跟人的想象力(imagination)联系起来。

18 世纪末期,由于“create”一词中“模仿”(imitation)的意思比较鲜明,西方文化开始探讨创造和“new”(新)或“novel”(新奇)的关联。进入 19 世纪,西方文化对所创造事物的“new”(新)或“novel”(新奇)的追求进一步强化,并且将原属于经济学范畴的“innovation”(创新)引入其中。20 世纪 20 年代,出现了 creative 的名词形式 creativity。creativity 是“创造力、创造性”的意思,所指向的正是事物的“new”(新)或“novel”(新奇)。求新、创新,新产品、新技术、新的管理理论等的创造成为主流。

语言是思想的重要载体,通过简要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创造”以及英文中“create”的词源及其演变的考察,可以看到:具有现代意义的“创造”一词在中国古代形成较早,内涵丰富,特点鲜明,涵盖礼仪制定、基业开拓、物器制造、文章创作等多个方面;西方相同意义上的“创造”一词形成较晚,以艺术为中介,从神学中脱离出来,逐渐运用到各个领域和世界范围,也形成了西方学者在创造学研究中的主导地位。

1.2.3 文化创造的研究

文化创造的研究是有关创造学和文化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而将文化和创造紧密联系起来的正是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创造力不是出现在真空中的。创造力的研究开端于创造性个体、创造性产品或者创造性活动过程等微观研究,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开始重视创造力所存在的情境——环境与社会的相关研究。环境总是存在的,并且对创造力的表达产生深刻的影响。环境可以激发和支持创造力,并且能够对其进行界定和评估。在这方面,近年来的理论普遍认为,环境变量与个体变量(智力、知识、认知风格、人格和动机)的共同作用是创造力所必需的(Amabile, 1983; Arieti, 1976; Csikszentmihalyi, 1988; Gruber, 1989; Sternberg, Lubart, 1991、1995)。关于环境,我们可以区分出一系列影响创造力而又相互联系的情境。这些包括物理环境、家庭、学校或工作场所、努力的领域和文化。文化是指一个特定人群所共同享有的系统,它包括认知、行为、风俗、价值观、规则文化,能被学习并在社会上代代相传。文化群体常常以社会阶层来区分,其次是以地缘政治的边界来划分的。在这些文化群体之内,按照年龄(如青少年文化)、社会经济阶层、宗教或其他特征,文化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种种亚文化。

从一个西方人的观点来看,创造力被定义为产生新颖的、适当的产品的能力。新颖的产品必须是原创的,不被预测的,与先前的产品有明显的不同。适当的产品则能满足问题的约束,是有用的,或者能满足一种需要。创造力可以产生于任何一个专业,包括视觉、艺术、文学、音乐、商业、科学、教育和日常生活,还涉及一群人与他们的社会和物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符号系统(Reber, 1985; Triandis, 1996)。

在西方人的眼里,创造力的一个重要特征似乎是其与一个可观察的产品的关系。这个产品能被一个适当的群体(同行或者是专家)评定。阿马拜尔提出,一个产品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社会评价。与已经提出的创造力概念相一致,当评估者评价一种产品,诸如诗歌或绘画的创造性时,主题的新颖性和适当性在他们的评价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与西方人的创造力概念相对应,东方人的创造力观点似乎很少关注创新的产品。相反,把创造力看成是涉及一种个人实现的状态与原始状态的联系,或是一种内部本质或最终现实的表达(Cha, 1970; Kuo, 1996; Mathur, 1982)是与冥想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它帮助人们看到自我、对象或事情的本质(Chu, 1970; Onda, 1962)。这种概念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把创造力看作是自我实现的一部分的观点相似。

西方的创造力研究着眼点主要在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以罗伯斯·斯滕伯

格为代表的美国心理学界主要是从个体心理与社会心理层面对创造力进行了科学性的研究,他们利用心理测试、工具性实验、建构模型的自然科学方法,探讨个体与社会心理的智力、动机、情结、习惯及环境等因素对于创造力实现的效用问题。而以托德·卢伯特为代表的学者是从文化角度对创造力进行解读的,这些学者认为,创造力研究不能只限于具有创造性的个体、产品或者过程,也应该重视文化和社会背景对创造力的激发、支持、界定和评估等作用。同时,他们还认为,不同文化的创造力实现途径与表现形式是相异的;在全球化背景下只要一种文化体现或保护其所依载的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条件,那么这种文化就应该是具有创造活力的。美国学者保罗·蒂利希于1959年出版的《文化神学》曾经提出,文化创造力的所有功能都指向了终极的人文关怀,任何一种文化模式都是其文化创造力的人文关怀的体现,所以理解一种文化模式便能够发现这种文化的终极人文关怀,也能发现其文化蕴含的创造力。英国学者费斯克在其所著的《理解大众文化》(1989)和《重估大众的文化创造力》(1970)等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反对文化商品化的观点,认为文化是活生生的意义生产过程,来源于不同社会阶层的大众是具有文化批判力的,所以,应当重视和发挥大众的文化创造力。雷纳认为,创造性是人与环境之间所特有的关系构造,而对大多数的人来说,环境指的是可以为人提供创造性基础的文化。文化给予人体现各种创造性的机会并限定了创造性发展的适当轨迹^①。可以说,西方学者从文化方面对创造力的解读,为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文化创造力研究提供了一定的有益借鉴。

日本的创造力研究在接受西方创造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之路。首先,日本的创造力研究深受西方创造力研究侧重心理学、教育学研究的影响,19世纪末,心理学实验室刚刚在欧美大学设立,而这一时期的日本也刚好开始颁布学制、整备大学,心理学以及教育学作为先进学科被引入日本的大学教育体系,并且在国家的大力推进下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大正时代(1921—1926),日本的创造、创造教育相关研究在学校教育开始展开。20世纪前期,与讲究实用主义的美国心理学相抗衡的德国心理学影响不断扩大,日本的创造力研究也逐步将格式塔心理学作为研究的理论基础。如黑田的“勘”

^① Raina M. K.: Cross-Cultural Differences, Encyclopedia of Creativity, Vol. 1, Academic Press(1999), 第453~464页。作者翻译并参考。

的研究》(1933)和波多野的《创造心理学》(1938)等日本创造力研究著作便是以格式塔心理学为引导的,并且已经注入了日本研究的独特性。另一方面,出现了从日本传统思想中挖掘文化创造力的研究动向。如恩田(1962)、中山(1983)将禅以及佛教思想作为视点展开的创造力研究,被看作是对抗欧美基督教思想以及科学思想的挖掘日本传统文化创造力研究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再次得以加强,进而成为此后日本创造力研究的指针。由于战后日本学校教育的飞速发展,发展心理学以及教育方法改善等被引入教育学当中,与此同时作为社会以及产业人才开发的社会心理学、产业心理学等也成为日本创造力研究的新视点。战后,日本创造力研究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欧美学界的影响下得以发展并形成自己的特色,从20世纪60年代起先后出现了市川的等价变换理论、川喜田的KJ方法、中山的NM方法、以产业能率大学为中心开发的创造性开放技法等日本创造力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另一方面,日本学者在文化和创造力相互关系的研究方面也开始关注不同文化对创造力发挥的影响问题,其中的代表学者有公文俊平和矢野正晴。公文俊平(1994)在《情报文明论》(NTT)中将文明分为兼容存续型文明和限定发展型两种文明。而矢野正晴等学者(2002)在《创造性的概念和理论》(NII)一书中认为“兼容存续型文明压制创造性、不会产生新价值,即使有时也会发挥创造性,也不过是对过去所发现的真理的再解释和具体化”^①;同时认为“限定发展型文明可以促进创造性的发挥并产生新的价值”^②。

中国的创造力研究也是在借鉴国外创造力研究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得以展开,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创造学、现代创造学、行为创造学等,而目前文化创造力的相关研究展现出以下两个主要的研究动向:

文化创造力的理论研究。李燕的《文化释义》(1996)对文化创造活动原理进行了专门的、详尽的、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内容涉及文化创造与人的创造

① 矢野正晴等:《创造性的概念と理論》,国立情報学研究所 NII-2002-001J(2002),第33頁。日语原文:“このような包括 存続志向型文明では、新しいものは価値がないものと見なされるので、社会は創造性に対して抑圧的となる。このような社会でも、創造性は発揮されることがあるが、それは、新しいものの創造ではなく、過去に発見された真理の解釈の提示、抽象的な真理の具体化というような形をとらざるを得ないことになる”。作者翻译,以下同。

② 矢野正晴等:《创造性的概念と理論》,国立情報学研究所 NII-2002-001J(2002),第33頁。日语原文:“このような限定 発展志向型文明にあつては、新しいものは価値あるものと見なされるので、社会は創造性に対して促進的となる”。

力的关系、文化创造的分层与整合、文化创造活动的规律。万资姿发表的《符号异化：现代人类文化创造焦虑之潜在根源》（2008）、《文化创造：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2009）、《符号：文化创造之逻辑起点》（2013）等文章，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化创造进行了阐述，认为文化创造体现为一种人类主体性的实现与被规定，同时在本质上也表现为一种人类符号能力的实现与被规定。杜刚在其专著《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创造力》（2012）一书中抓住文化创造力这一核心问题，一方面进一步阐明了文化创造的现实内涵、生成原则；另一方面，对文化创造力的含义、构成要素等进行了剖析，同时也对全球化视域下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现实生成提出了独到的理解和建议。

发掘中国文化创造力的研究。刘仲林所著的《中国创造学概论》（2001）在比较中西创造观的同时，通过对《易经》的分析，总结出了中国传统创造观中创造力构建的思维、技法及总体追求。王忠的《中国传统创造思想论纲》（2007）从创造价值观、意会认识论和意象思维模式等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创造观进行了解读。艾四林的《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显著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2012）分析了中华民族创造活力的激发对国家软实力增强的促进作用。辛向阳在《让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2013）一文中从文化生产力、学术和艺术民主等方面论述了文化创造力的提升问题。沈壮海教授发表的论文《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创造力源泉的作用》（2016）认为，中华文化中蕴含着可以转化、生成为或有助于提升中华民族当下创造力的文化因素。

通过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梳理，可以发现，文化创造力的理论研究还相对薄弱，文化创造倾向的专门研究还没有充分地展开；文化创造力的提升策略上更多的是关注传统文化中创造力的发掘和现实转化，从多元一体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探讨文化创造力提升的研究还较少。因此，本书通过考察中日文化创造力在近代之前不同表现总结中日传统的文化创造倾向，并在此基础上浅析近代以来中日文化更新与文化创造倾向的逻辑关系，进而结合多元一体的文化格局提出相关的文化创造理论指导当前中国的文化创造力提升。

1.2.4 中日文化比较的视点和方法

中日文化的比较研究是一个内容丰富、范围广泛的课题，迄今已在不同程